

# 认同视角下的阿以冲突\*

谢立忱\*\*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阿以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而对于阿以冲突中的认同因素特别是以色列犹太人的认同缺少应有的学术观照。大体上讲,1967年“六天战争”后以色列认同的空前强化导致大以色列主义迅速抬头;20世纪80年代后,在以色列社会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以色列渐渐出现认同危机,中东和平进程一波三折;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爆发使得以色列暂时摆脱认同危机,“隔离墙计划”和“单边计划”随之出台,导致中东和平进程更加曲折难行。

**关键词** 阿以冲突 中东和平进程 宗教认同 民族认同

中东和平进程不仅涉及领土争端,在根本上还关系以色列民族认同(主要指犹太人的认同,下同)。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相互关联,而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sup>①</sup> 本文,笔者拟从以色列民族认同的角度对阿以冲突尤其是中东和平进程进行专门分析。

## 一 犹太认同的凸显与大以色列主义

### (一) “六天战争”与犹太认同的凸显

以色列民族认同主要由四方面构成,即大屠杀、宗教、民族主义和自由

---

\* 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亚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因素”(项目编号:2012322);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项目编号:10CSS010)的资助。

\*\* 谢立忱,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亚洲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9.

主义。<sup>①</sup>其中,大屠杀、宗教、民族主义三个要素从不同方面铸成了以色列强烈的孤独感和威胁意识。所有的民族认同均使“我者”明确区别于“他者”,但作为以色列民族认同的这三个要素却使这种情感的、认知的边界变得更加难以撼动。<sup>②</sup>这三个要素无一例外地强化了以色列的犹太认同或凸显了以色列民族认同中的犹太因素。以色列有着多种认同,大多数犹太人既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也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以色列认同和犹太认同二者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但不同时期二者的地位和对外政策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相比之下,犹太认同是以色列持有的一种重要认同,其对外政策的作用是最大的。以色列的犹太认同影响着决策者和大众的世界观、对外认知、信念、价值观和态度。这种影响可以追溯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时期,并存在于以色列历届政府的外交实践中。不过,犹太性在定义以色列民族认同和塑造以色列对外政策方面的作用,与以色列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存有密切关联。大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以色列民族认同中的公民成分大于种族宗教成分,“以色列性”主导着以色列民族认同的话语,犹太性相对处于边缘地位。这一时期以色列对外政策主要受国家主义或以色列认同的影响。但自60年代初特别是1967年以后,直到80年代末,“以色列性”转而退居边缘地位,犹太性逐渐主导以色列民族认同的表述,犹太认同对以色列对外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 Mead)的“符号相互作用论”,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主我和客我互动的结果。群体被他人特别是“重要他人”怎么看和对待,关系到群体如何看自己。从此意义上讲,国际社会扮演的是以色列“我者”的“泛化的他者”身份。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自1967年以来,由于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占领了阿拉伯国家大片领土,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之声日高,许多以色列犹太人将这种谴责视作国际社会反犹太主义的体现,致使以色列孤立主义明显抬头,犹太认同空前强化。第二,“六天战

① Shibley Telhami and Michael Barnett,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63.

② Yael Zerubavel, *Recovered Roo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Israeli National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69.

争”后，伴随以色列社会意识形态图景的剧变，工党犹太复国主义主流地位的下降，以色列人的弥塞亚情绪和“大以色列”呼声日高，“犹太意识”迅速抬头。第三，“六天战争”中以色列的辉煌胜利激起海外犹太人心中的一种空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一股支持以色列的狂热势头，更多海外犹太人转而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导致犹太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 （二）犹太认同的凸显与大以色列主义的急剧抬头

虽然以色列对外政策中的犹太因素一直存在，但受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国家主义的制约，犹太性的作用一度受到很大限制。“六天战争”后，伴随工党犹太复国主义的破产，以色列民族认同中公民性的下降和犹太性的上升，大以色列主义急剧抬头，犹太认同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显著增大，特别是贝京任期内的以色列对外政策更充分体现了犹太认同的这种重大影响。这突出表现为以贝京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在领土问题上的大以色列主义。以贝京为代表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坚持犹太人对“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包括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拥有主权。对贝京来讲，放弃这些领土意味着将丧失以犹太性为核心的以色列民族认同。正如贝京曾指出的“我们犹太民族恰恰诞生在此地……我们依靠历史而存在。没有伟大的过去，我们将会是谁？”<sup>①</sup>

贝京时期，以色列对外政策（主要是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贝京的这种信念。但是，贝京也认识到从“事实兼并”到“合法兼并”需要一个过程，且短期内实现完全吞并也不切实际，因而致力于逐步吞并。为此，贝京首先通过与埃及和解，试图消除埃及的反对情绪，同时拖延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从而为其在被占领土上采取各种兼并行动赢得时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定居点建设。贝京上台后，放任、支持犹太定居点建设，以实现“事实兼并”。1977年贝京上台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只有24个犹太人定居点；1983年贝京下台时，犹太人定居点猛增到106个。<sup>②</sup> 贝京政府最重要的意图，就是通过支持被占领土上

<sup>①</sup> Dov Waxman, *The Pursuit of Peace and the Crisis of Israeli Identity: Defending/Defining the 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59.

<sup>②</sup> Dov Waxman, *The Pursuit of Peace and the Crisis of Israeli Identity: Defending/Defining the Nation*, p. 60.

的定居点建设以造成“既成事实”，有效消除未来领土妥协的可能性。虽然吞并占领地区的目标一直深刻影响着北京的阿拉伯政策，但在北京的不同任期，以色列的对阿政策仍有所不同。大体而言，1977年至1979年以色列的对阿政策相对温和，具体表现为《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的签订。1980年至1983年以色列的对阿政策则相对激进，具体包括兼并戈兰高地，入侵黎巴嫩。相比之下，第二届北京政府的领土立场变得更为强硬，彻底兼并被占领土成为主要政策目标。为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北京政府不惜发动黎巴嫩战争。因此，这场战争是北京领土政策的副产品。正如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fael Eitan）所称“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以色列地’而战，并非是为了贝鲁特和基督徒。”<sup>①</sup>

## 二 认同危机与中东和平进程

### （一）黎巴嫩战争、第一次“因提法达”对犹太认同的冲击

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的行为逐渐超出最初宣称的既定目标，而与北京等向民众传达的信息发生冲突，即这是一次有限的军事侵入、一次“没有选择的战争”。特别是1982年9月发生的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事件，更对犹太人自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有道德的民族的身份认同构成巨大冲击。在许多犹太人看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是不必要的、野蛮残酷的，以色列并不总是正义的，它的军事行动也并不一直是正当的，其领导人对本国民众也并非总是诚实的。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黎巴嫩战争的泥沼使犹太民族主义遭遇了自己的神话。”<sup>②</sup> 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因提法达”像黎巴嫩战争一样，对以色列民族认同特别是犹太认同构成了重大挑战。以色列士兵在“因提法达”期间，攻击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种种粗暴行为，使以色列的民族形象严重受损。以色列犹太人长期认为，在与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他们实质上是受害者。<sup>③</sup> 然而，在以

① Dov Waxman, *The Pursuit of Peace and the Crisis of Israeli Identity: Defending/Defining the Nation*, p. 63.

② Dov Waxman, *op. cit.*, p. 69.

③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 - 1999*,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p. 191.

色列国内外的许多人看来，以色列现在似乎成了迫害者而非受害者，其行为是违背道德规范和公正原则的。而作为独特的、极其注重道德的民族自我感知，是犹太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历久不渝的方面。

总之，黎巴嫩战争和“因提法达”均使以色列民族认同特别是犹太认同受到重大冲击，损害了以色列人的民族形象，加剧了以色列内部的分歧，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忠诚，导致民众要求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以色列政府尤其是沙米尔总理为了弥合国内这种分歧和民族认同的裂痕，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1989年5月17日沙米尔向议会提出“四点和平计划”（通过被占领土上进行选举，指定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巴勒斯坦代表，双方先就过渡时期的自治问题进行协商，然后再进行最终地位谈判）。沙米尔强调指出，犹太人团结和民族一致的需要是提出该和平倡议的主要动机之一。<sup>①</sup>

## （二）民族认同的重塑与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启动

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能够启动与拉宾总理对以色列民族认同的新认识密不可分。拉宾和沙米尔对以色列民族认同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对阿以尤其是巴以和平问题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沙米尔提倡的是以孤独、受迫害、骄傲、反抗、特殊主义为内涵的犹太认同，因而他坚决不与巴勒斯坦人妥协，坚决不放弃“以色列地”的梦想。但在拉宾看来，冷战后，以色列在国际上不再像以往那样处于孤立和危险境地。同时，以色列社会个人主义日益盛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日衰，人们更关心个人的自由、安全和福利，而非“以色列地”之梦。因此，拉宾要重塑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公民性的民族认同，使以色列成为一个自由的、繁荣昌盛的、正常的民族。拉宾认为，和平恰恰是实现以色列民族认同这种变更的催化剂。所以，拉宾力倡和谈，高度重视以色列公民的个人利益。任总理期间，拉宾在公开讲演和接受采访等许多场合多次谈论以色列民族认同问题，并将其同巴以与阿以和平进程相联系。通过与阿拉法特握手，拉宾不仅发出了巴以和解新时代开始的信号，而且敲响了新的以色列民族认同诞生的钟声。同时，鉴于《奥斯陆协议》将被国内反对者指责为是对以色列人犹太

<sup>①</sup> Dov Waxman, op. cit., p. 78.

认同的一种否定的考虑,以及民族认同可以使某些政策显得合理和可取,拉宾和佩雷斯在向民众提出和平政策时,经常将和平政策与以色列认同、犹太认同挂钩,即奥斯陆和平进程是按照犹太的、民主的、人道的、自由的以色列民族认同来设计的,结束占领将有利于消除以色列民族道德品质上的污点,并使以色列民族认同的积极方面得以恢复。

### (三) 认同危机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

从一开始,以色列民族认同就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背景下形成的。奥斯陆和平进程意味着以色列人长期用于界定自己的“他者”的丧失,这使以色列民族认同面临严峻考验。加之,全球化、世俗化、来自苏联的大量新移民、阿拉伯人要求获得平等公民权的主张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一切大大强化了以色列社会的多元色彩,并引发认同危机,同时也打开了认同问题的潘多拉魔盒,使以色列社会变得空前脆弱和分裂。各种次文化群体和组织都在追求一种所谓“承认的政治”,致使以色列社会的碎片化,以至有人用“部落文化”来形容以色列民族认同的脆弱。这种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色列人”或以色列认同和“犹太人”或犹太认同之间的冲突的白热化。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认同冲突导致拉宾被刺和内塔尼亚胡上台,进而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1995年,拉宾的遇刺可视为这种冲突的暴力体现。刺杀拉宾的伊格尔·阿米尔(Yigal Amir)像许多犹太教右翼分子一样,认为拉宾放弃对“以色列地”的占领是对犹太民族的背叛和威胁。阿米尔的行为是“以色列人”与“犹太人”之间斗争的极端体现,彻底暴露了“以色列人”与“犹太人”、和平进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1996年大选中,内塔尼亚胡的胜出则是这种冲突的和平体现。1996年大选中的认同政治因素比以往任何一次大选都突出,领土问题不再是压倒性的政治议题,而成为更大问题(以色列应成为什么类型的犹太国家)的一部分。在这次大选中,许多以色列犹太人表示,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犹太色彩更为浓厚的社会。内塔尼亚胡能够险胜,同佩雷斯的“新中东”设想明显忽视了以色列的犹太认同密切相关。与佩雷斯似乎是全球化的鼓吹者不同,内塔尼亚胡坚决支持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注重民众的文化焦虑,反对世俗的大同主义,其俨然成

了“犹太传统”的守护者。结果，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大选中，获得的犹太人选票比佩雷斯多12%（56%和44%）。<sup>①</sup> 在解释正统犹太人几乎一致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原因时，以色列哲学家摩西·哈尔伯特尔（Moshe Halber-tal）谈道：“佩雷斯掉入了以文化术语界定和平的陷阱。将和平理解为以色列‘脱离’巴勒斯坦，他把和平诠释为以色列最终融入世界，以色列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西方化的社会。这样，在那些正统犹太人看来，和平进程成了削弱犹太认同的代名词。”<sup>②</sup> 据称，佩雷斯在总理竞选失败的次日讲道：“以色列人失败了，犹太人胜利了。”<sup>③</sup> 相关民意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看法，内塔尼亚胡和佩雷斯的支持者之间存在较大认同差异。内塔尼亚胡支持者之中，68%的支持者视犹太认同为他们的首要认同，29%的支持者把以色列认同视作第一位。<sup>④</sup> 佩雷斯支持者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32%的人首要是犹太认同，66%的人是以色列认同。<sup>⑤</sup>

拉宾的遇刺和1996年大选凸显了以色列民众在以色列民族认同界定问题上的深刻分歧，标志着广大民众对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民族认同的“去犹太化”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利库德和宗教右翼政党联合政府的上台。该联合政府强调以色列民族认同中的种族和宗教成分，并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内塔尼亚胡在中东和平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强硬，提出“以安全换和平”，致使巴以关系严重恶化，和平进程大大受阻。当然，鉴于巨大的国际压力，特别是以色列社会的多元认同图景也有效迫使内塔尼亚胡在当政期间继续推进奥斯陆和平进程，甚至向巴方做出了可观的让步。

在1999年5月以色列举行的大选中，以色列社会这种多元认同政治景象进一步清楚地呈现出来。在1999年议会选举中，利库德和工党两大党的票数双双下降，而代表着不同认同背景的群体利益的许多小党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这种突出的认同政治对新上台的埃胡德·巴拉克的阿拉伯政策产生多方面影响。首先，这种认同政治进一步凸显以色列的认同危机，使得巴拉克为构建统一民族认同，避免内部分歧和认同危机的加剧，选择

① Dov Waxman, op. cit., p. 127.

② Dov Waxman, op. cit., p. 127.

③ Dov Waxman, op. cit., p. 128.

④ Asher Arian, *The Second Republic: Politics in Israel*, Chatham, N. J.: Chatham House, p. 7.

⑤ Asher Arian, *The Second Republic: Politics in Israel*, Chatham, p. 8.

先解决以色列的外部冲突,而不是内部冲突,从而有力推动了阿以和平进程。正如他自己在一次讲演中所谈道的“我确信,同邻国间冲突的解决是我们成功处理国内问题的重大跳板,最终将消除我们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的有害分歧,弥合各种社会裂痕。”<sup>①</sup>其次,这种多元认同政治图景给巴拉克提供了多种组阁选择,从而有助于调和各种群体或党派间的分歧,取得它们在阿以和平问题上的支持,并有利于减少利库德对阿以和平进程的阻力,使得巴拉克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并能够对巴方做出空前妥协(主要包括以色列放弃对耶路撒冷城部分地区的主权和允许一些巴勒斯坦难民回到以色列)。

然而,以色列社会的多元认同图景虽动摇了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社会的“话语霸权”,打破了公共话语中的许多禁忌,使得原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信条和观念现在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曾经看来不可思议的想法也变得可以接受了。这使得巴拉克能够对巴方做出空前的妥协,但以色列的犹太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仍限定着巴拉克的决策选择,将其约束在民意主要是犹太人容许的范围之内。事实上,与拉宾和佩雷斯忽视犹太人认同和削弱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性不同,巴拉克也强调保持以色列国家的犹太特性和捍卫以色列犹太认同的重要性。因此,巴拉克只是给予巴勒斯坦人对东耶路撒冷某些地区的主权,且这些地区是远离城市中心的阿拉伯人聚居地区,并属于1967年后耶路撒冷的扩建部分。特别是在圣殿山的主权问题上,巴拉克对巴勒斯坦人寸步不让。因为圣殿山像耶路撒冷一样,对以色列犹太人有着重大象征意义,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正如巴拉克曾指出的“我不知道哪位以色列总理会愿意在转让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根基的圣殿山主权的协议上签字。”<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减少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人的数量,以长期确保犹太人多数和犹太国家属性,这是巴拉克愿意分割耶路撒冷部分主权的主要动机。另外,为捍卫以色列的犹太认同,巴拉克也不承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负有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拒绝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因为接受这种回归权,将导致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从而威胁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同

① Dov Waxman, op. cit., p. 155.

② Charles Enderlin, *Shattered Dreams: the Failure of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1995 - 2002*,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3, p. 223.



时，承认这种责任，将会改变犹太人在阿以冲突中的“受害者”形象，对以色列民族认同中的受害者意识构成巨大冲击，进而挑战以色列犹太认同和民族认同。

### 三 身份的重拾与“隔离墙计划”“单边计划”

#### （一）“他者”的再现与身份的重拾

2000年爆发的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因提法达”使巴以关系和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关系均发生逆转。奥斯陆和平进程曾一度消除以色列犹太人的共同敌人，离开巴勒斯坦这个敌人，他们便彼此为敌——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左翼与右翼、阿什肯纳兹人和米兹拉希人之间的对立等，不一而足。伴随和平进程的停滞和巴以暴力冲突的再现，巴勒斯坦人再次成为以色列的敌人，这种久违的包围感和“他者”的再现以及和谈希望的破灭极大强化了以色列犹太民族的自我认同，弥合了犹太人内部的裂痕，一度平息了犹太人有关以色列为实现和平应做出何种妥协的长期争论，暂时摆脱了认同危机，恢复了犹太人在对外政策上的民族一致，转而共同致力于保卫国家生存的战斗。

#### （二）“我者”意识的强化与“隔离墙计划”“单边计划”

巴勒斯坦人“他者”的再现，强化了以色列犹太人的传统身份与观念认同，导致犹太人的“我者”意识和独处意识迅速抬头，并重新恢复了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社会不可撼动的“话语霸权”，致使民众广泛支持沙龙政府的“隔离墙计划”和“单边计划”。

以色列犹太人支持“隔离墙计划”和“单边计划”的背后，不仅隐含着以色列公众对安全的渴望，而且也表达了以色列犹太人要与巴勒斯坦人隔离的长期夙愿。从奥斯陆和平进程启动开始，许多以色列人支持它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摆脱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痛苦的纠缠。然而，和平进程的明显失败使得以色列人日益赞成基于同样目标的替代方案，即单方面撤到隔离墙后面。正如以色列一位评论家在解释公众对“单边隔离”的支持时所讲的“‘单边’意味着以色列能够做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必获

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巴勒斯坦人的同意。‘隔离’则意味着没有更多的巴勒斯坦人。”<sup>①</sup> 巴拉克说得更简明扼要 “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sup>②</sup> 同时，“隔离墙计划”和“单边计划”对于长期确保以色列国家的犹太身份也尤为必要。沙龙和其他利库德集团领导成员均认识到，单方面从部分约旦河西岸和整个加沙地带撤离，对于长久确保犹太人多数和以色列的犹太属性是非常必要的。考虑阿拉伯人的高出生率，以及来自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洪流已成涓涓细流，确保以色列犹太人多数的比较可行的方法便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口密集地区与以色列之间修建一道隔离墙，把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隔离在以色列国家边界之外。因此，沙龙政府设计的隔离墙路线，并未严格沿着绿线修建，而是深深切入约旦河西岸地区，以包括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这样设计的隔离墙修建路线的主要目的就是使隔离墙的以色列一侧的犹太人尽可能地多，巴勒斯坦人尽可能地少。有鉴于此，到2004年，尽管以色列强行修建隔离墙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谴责，但以色列仍一意孤行，2005年2月20日以色列内阁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修正后的“隔离墙计划”和“单边计划”。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因提法达”的阴影下，以色列犹太社会重新实现团结，至少暂时摆脱了认同危机。那些要求以色列成为一个公民国家的强烈呼声，现在恰恰已变成一种非主流声音。旧有的、一度行将衰落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核心思想得以重新盛行。后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时代即奥斯陆时代的一种遗迹，只有少数顽固的信徒仍笃信这一意识形态。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瑟戈夫(Tom Segev)所评论的“这次‘因提法达’迫使我们回到原来的自己，重新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正促使我们回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怀抱。我们现在似乎感到，由于阿拉伯人，我们必须再次为生存而战斗。”<sup>③</sup> 在以色列的犹太认同和以色列国家的犹太特性遭到长期的质疑、挑战之后，以色列犹太社会几乎全体一致地重新认同这些核心信念，致使中东和平进程更加曲折难行。例如，2010年10月11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上称，如果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可以考虑延长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限

① Dov Waxman, op. cit., p. 180.

② Dov Waxman, op. cit., p. 181.

③ Dov Waxman, op. cit., p. 186.

建令。然而，考虑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巴勒斯坦方面表示强烈反对。事实上，巴以在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致使 2013 年 7 月 29 日在华盛顿重新启动的巴以和谈陷入困境。总之，从认同的角度讲，未来阿以和平的真正实现将取决于以色列民族认同的再次变更。

[责任编辑: 李 玮]

ment agency was adjusted accordingly , each party formed the consensus of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join the EU and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EU concerned ,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EU's activities , and the woman's suffragist rates had unprecedented increase. Cyprus government adjusted its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joined the EURO , and the EU became as Cyprus's main trading partner. After joined the EU , Cyprus retreated from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carry out EU's foreign policy , the relations with Greece have also changed. The links between "TRNC" and EU established , Turks of Cyprus became the EU citizen , but the identity limited by many facts , the United States also adjusted its policy to "TRNC" . Media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 Greek and Turkish Cypriots both showed desire peace talks , but they were all lack of sincerity. In the long run , Cyprus joined the EU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unification of Cyprus.

**Keywords:** Cyprus , EC , EU , TRNC

##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the Angle of View of Identity

*Xie Lichen*

**Abstract:** In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 academics mainly take realistic research paradigm about Arab-Israeli issue , but neglect the factor of identity of Arab-Israeli conflict , especially Israeli Jews' identities. Generally , "Greater Israel" rapidly gained popularity because of unprecedented strengthening of Israel's Jewish identity after the Six-Day war; After the 1980s , Israeli national identity appeared the cris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nature of Israeli society , which mad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tortuous; The second Palestinian Intifada made Israel temporarily extricate itself fro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2000 , which promoted "barrier plan" and "unilateral withdrawal plan" and mad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more flexuose.

**Keywords:** Arab-Israel Conflict ,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 Religious Identity , Ethnic Identity